



走过青春

## 记得这个日子

夏广忠

1月28日,我永远记得这个日子。因为54年前的这一天,我和很多同学乘上时代的列车,离开北京,离开学校和家乡,远行千里,去陕北延安插队。

那时的我们,书生意气,风华正茂,一心向往着陕北,向往着延安和洛川。因为很小的时候,我们就从书本上知道,陕北是毛主席率领工农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而胜利会师的地方。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是新中国的摇篮。而我们前往的

插队所在地洛川,曾经召开过著名的洛川会议。会上,为全国抗战制定了正确路线和战略总方针,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明确了我军的战略任务和战略方针,对进行抗战和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来陕北插队,我们由莘莘学子转变为在黄土高原这片广阔天地中自立务农的一代知青。在这片土地上,我们要和陕北农村的社员一样吃苦耐劳。

我们要干农活、栽果树、修水库,和他们一道,努力把洛川建设成果果鱼米之乡。

直到今天,我仍然为我们曾经的这段特殊经历而骄傲。因为我们是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的最早践行者,我们是第一批去黄土高原插队落户的北京知识青年。

时光不语,岁月成诗。我会永远记得这个日子——1969年1月28日。

## 陕北记忆

王春英

1969年1月,我和26800多名同学伴随着北京站火车的汽笛鸣响,伴随着渐行渐远的两条火车铁轨,也伴随着我忐忑不安的心情,越走越远,心也变得一片空白。

我们就这样响应祖国号召,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来到了陕北延安。至于我们面临的是什么?什么时候能回家?都是未知数。

就这样,我和互不相识的12名知青共同组成了一个知青小队,来到黄河岸边一个叫依锦村的地方。

初来乍到,不习惯这里的生活方式。我们知青由于贪睡,往往是在乡亲们各自拿着工具、迈着步子走向田间地头的时候,我们才一路小跑,紧追慢赶地来到劳动的地盘。

生产队的活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我只能站在老乡身边学着锄地、拿粪、撒种子。这些活看似很简单,其实很复杂。锄地也有技巧,地上的苗和草贴在一起,在我看来,长的就是一个模样。由于分不清苗和草,我不知把多少无辜的庄稼苗锄掉,而留下了草。只要是我锄过的地垄,老乡还要重新走一遍。对于这种费时费力的循环,我的心中充满

着不安,总怕受到责怪。可我的父老乡亲们从未责怪过我,他们有的只是耐心与宽容。

农村生活中,驮水是每天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我们村村口有一条通往沟底的小路,沟底有一个石缝可以流出泉水,水清凉甘甜。村里人就在这里用石板砌了一个四四方方的池子,供全村人吃水用。刚开始的时候,每当轮到我们知青给队里的饲养室驮水的时候,总有老乡陪伴着我们。驮水回村的路上,我们知青有时恶作剧般骑在驴背上,看着驴步履缓慢地爬坡。我当时并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妥。在老乡的开导与劝说下,我才从驴背上跳下来。现在想来,当时,人都累得气喘吁吁,何况小毛驴还驮着百十斤的两个大水桶。驴身上除了桶还有架子,我还骑着它,实在是不应该。

回家探亲,在当时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的回家路途要经过黄河,要从村里下到黄河滩,再坐羊皮筏子过河,到山西吉县后,才能坐火车回北京。有一次,为了节约几块钱,我冒着危险过河。现在想来,心里都害怕。

那是1974年一次回家途中,我再次

从村里走到黄河滩,只见几个吹足了气的羊皮筏子零散漂浮在岸边。因为回家心切,我等不上扎成排的筏子过来,就和船老大商量拉我过河。经他同意后,我把衣服塞到筏子里。船大哥给他绑一个筏子,给我绑一个筏子,就顺流而下。当时,我总觉得自己在学校里学游泳,所以就天不怕地不怕地开始横渡黄河。再者觉得船大哥守护在我的身边,所以丝毫不担心会有什么危险。可在过河途中,黄河的表面看似静止,其实水下有起伏不停的小浪在推动着我前行,还有数不清的漩涡。在过河期间,当感到水下有漩涡的时候,船大哥就拉紧我坐的皮筏子的绳子,把我带过一个漩涡。一路上,经历了无数次惊心动魄。当皮筏子终于到了河对岸,我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感到自己真是死里逃生。

在我插队的日子里,父老乡亲都是耐心地指导我们、帮助我们,无论我们犯过多少错,做过多少不近人情的事情,乡亲们也都毫不计较。如今,我虽然离开了陕北,但那里的山山水水,那里的冬暖夏凉的窑洞,那里的关心爱护过我的父老乡亲,这一切,并没有离我远去。

## 在陕北过年

徐大益

人的一生不知要过多少个年,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年,是1969年的春节。

那是我到陕北农村插队不久,也是我离开家在外过的第一个年。

我们刚到村里时,村里只给我们安排了住处,几个知青住一个老乡的窑洞。当时,知青吃饭的问题一时半会儿得不到解决,生产队就对我们实行了派饭制。

临近春节了,老乡们家家忙着杀猪宰鸡,购置年货。那时,我们都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十七八岁的孩子,啥都不知道准备。一天到晚除了上工就是玩,啥也不想。眼看着就到年跟前了,这年咋过?没办法,生产队派人来帮助我们磨了豆腐,换了粉条,并且还给了每个知青小队一头杀好的羊。陕北的羊也不大,都是山羊。

拿到了这些年货,我们几个同学在一起商量着年夜饭怎么做。这可是我们来陕北插队过的第一个春节啊!我们正商量着,队长来了。我们把队长让进窑,请他炕上坐。他也不坐,立在一旁,拿出他的旱烟袋,装上一锅旱烟。然后走到灶前,从灶旁的一捆玉米秆中抽出一片干玉米叶子伸到灶火里点燃。接着将烟锅凑到火苗上,引燃了旱烟,吧嗒吧嗒抽了两口。我们知道队长有话要说,都看着他。

抽完烟,队长在鞋底磕了磕烟灰,说道:“今天就别做饭了,一会儿跟我走。”

听了队长的话,我们几个面面相觑,不知其意。我心想:“管他呢,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听贫下中农的安排没有错。”

由于晚饭不用做了,大伙有的聊天,有的伏案给家里写信,有的跟队长搭讪着。

“走吧!”日落西山之时,队长对我们说。

我们三男四女共七个同学尾随着队长往后沟山坡上走去。

当时正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山坡上残留着积雪。队长背着手,弓着

腰在前面走着,不时回过头来跟我们说话:“今天过年,你们就在社员家吃饭。”

我们来到一户社员家,主人已在门口等候。男主人掀开门帘,把我们让进窑洞,窑里已经点上了煤油灯。上炕落座,主人热情地招呼着我们。

“抽烟。”男主人递过烟来,对我们几个男同学说。

刚走出校门的我们哪里会抽烟啊!于是赶忙推辞。

队长劝道:“那就抽一支吧,你们也是大人了,要学会抽烟。”

这也是人家的一片心意,我的抽烟史就是从这天开始的。

由于是过年,老乡才备下纸烟招待来客。平日里,他们抽的是旱烟,点火还是用火镰。火镰是专门打制的一种取火工具,铁质,不到5分硬而那么大,形状像个镰刀。拿它与火石击打,碰出火花后,引燃棉球再去点火。

“没想到抽个烟也这么难。”我心里想着。

炕角,盘腿坐着一个老婆婆,她一个人在那里包饺子。陕北人包饺子很独特,她们从来不擀饺子皮,她们的饺子皮是用手捏出来的。和面,揪揪子,揪完揪子就把揪子放在手心,另一只手配合着把揪子捏成一个小碗状,这就是饺子皮。捏成一个饺子皮是要好几分钟的,然后再从一头开始包起,直至全部合拢,一个饺子就包成了。但还没有完工,最后再把包好的饺子像北京人那样挤一下,这才算大功告成。

说话中,饭菜已经端上桌。在陕北,农民是很苦的,但是年过得还是挺隆重的。家家杀猪宰羊,所以年夜饭比当时的城里人还要丰盛。我记得有白斩鸡、猪肉粉条、酸菜炖肉、炖豆腐、胡萝卜炖羊肉、猪肉肉……还有些说不上名字的菜。最让人新奇的是主食,什么炸糕、油馍馍、黄米馍、黏豆包等。陕北不产稻米,没有江米,却出产一种黏糜子,也叫黄米,用来替代江米。做出来的食物都是黄颜色的,倒

是别有一番风味。就连米酒也是用这个做的,还挺好喝。我看女同学可能是爱吃黏的食品,她们频频光顾那些油炸黏食。有一个女生,简直就不吃别的主食,只是一个劲儿地吃那个炸糕。后来因形似,我们把它称作“鞋底子”。

陕北的炸糕与用江米做的糕不一样,它是用黄米制成,还在中间裹了枣泥,比起江米做的年糕更有风味。它是放凉了不能吃,太硬。

写到这里,不得不提陕北的酸菜。我们刚到延川吃的第一顿饭就有酸菜。那是我们进村前的最后一站——公社。那天已近中午,公社招待我们吃午饭,每人两个烧饼、一碗酸菜。酸菜是由白菜丝、胡萝卜丝和白萝卜丝做成的,酸酸的。很多同学说吃不惯,我倒觉得味道还可以。

当我们吃得津津有味的时候,队长说:“好了吧,咱们该走了!”

“怪了,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今天是怎么了?”我心里充满了疑惑。

不顾主人的再三挽留,我们跟随着队长出了院门,队长边走边对我们说:“少吃点吧,后面还有十几家呢!”

“我的天,你怎么不早说啊?这叫我们如何是好!”

至今我还记得,每到一家,那个爱吃黏食的女同学将手一边伸向食物,一边喊道:“炸糕。”就这样,我们蜻蜓点水般地走着吃着,最后也没吃几家就再也吃不动了,就打道回窑了。队长还得挨家去通知:“娃们不来了。”

后来,听说那个最爱吃黏食的女同学吃完饭的当天夜里直叫肚子疼。原来她共吃了十六片炸糕。黏制品的食物是好吃,可不能多吃。那时我们刚刚离开家,没人约束又不懂,尽犯傻事。

第二天一大早,有老乡前来敲我们的门。开门一看,原来是昨晚我们没有光顾人家家里的老乡。他们嫌我们昨晚没有到他们家去,非要我们今天补上不可。听了老乡们的话,我们说:“今天谁家也不去,因为昨晚吃的东西还没消化呢!”



● 增福添寿



● 贺岁迎春



● 恭喜发财



● 腰鼓迎春

作者系北京知青王俊林